



JPC

Journal of Publishing and Criticism

JPC, Vol. 1, No. 1, 2026, pp.97-106

Print ISSN: 3107-0892; Online ISSN: 3107-09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p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pc260110cdmim>



狂欢与对话：《白鲸》的多元文化阐释

黄永亮（Huang Yongliang）

摘要：19世纪美国兴起了民族文化独创的热潮，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美国在文化上更具有多元对话的特点。梅尔维尔的作品体现了时代的多元文化特征。以《白鲸》为例，结合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论，本文指出它对人物形象的加冕和脱冕蕴含了狂欢文化自由平等的精神，强调了社会地位和权势具有相对性；小说中有色人种的文化和其它边缘化的事物瓦解了白人文化的中心地位，呈现了多元异质文化平等共存的格局；不同人物思想意识的交锋对话突出了个体意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关键词：赫尔曼·梅尔维尔；多元文化；狂欢；《白鲸》

作者简介：黄永亮，韩山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邮：604413567@qq.com。

Title: Carnival and Dialogue: A Multi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Moby-Dick*

Abstract: The 19th-century wave of creating national culture with originality made America more culturally diversified and dialogic in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Such a multicultural stage is reflected in Melville's works. Based on a reading of *Moby-Dick* through Bakhtin's theory of carnivalizatio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by crowning and decrowning characters, the novel displays the carnivalistic spirit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and the relativity of social privilege and status. The non-white cultures and other marginalized aspects dismantle the centrality of white culture, presenting a landscape where diverse heterogeneous cultures coexist as equals. The clash and dialogue of characters' thoughts highlight the heterogeneity and diversity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Received: 01 Jan 2026 / Revised: 06 Apr 2026 / Accepted: 26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Keywords: Herman Melville; *Moby-Dick*; multiculturalism; carnival

Author Biography: Huang Yongliang, Lecturer at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604413567@qq.com.

引言

十九世纪早期美国刚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取得政治独立不久，其文化总体上来说还处于模仿和学习欧洲模式的阶段。随着美国国民对文化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美国作家视创作具有美国特色的民族文学为己任。他们在扬弃欧洲文化传统的同时，努力挖掘美国的本土素材进行文学独创，由此造就了“美国文艺复兴”。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自1846年出版处女作《泰比》（*Typee*）后，又创作了《奥穆》（*Omoo*, 1847）、《玛迪》（*Mardi*, 1849）、《雷德本》（*Redburn*, 1849）、《白鲸》（*Moby-Dick*, 1851）等小说，由于他曾当过航海水手，所以作品大多与航海生活有关，也很具有美国特色。梅尔维尔并不甘心当一个只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家，而是力图以有思想深度的作品为刚刚起步的美国文学的发展添砖加瓦。大多情况下，他喜欢写的东西却常不为读者所青睐，甚至受到冷眼讥讽，到去世时他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了。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经过欧美作家和评论家的挖掘和推崇，梅尔维尔作品的价值才重新被人发现，最终确立了他作为文坛巨匠的地位，而且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他的作品是“一个开采不尽的富矿”，他的重要地位有增无减（刘意青，2020，p.5）。

国内梅尔维尔的研究专家杨金才（2017，p.3）认为美国性是其作品的一大特征。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惠特曼（Walt Whitman）等作家对美国社会和前景过度乐观的态度不同，梅尔维尔对于19世纪美国民族的个性和行径，如自由和民主、西进运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领土扩张，既有称赞欢呼的一面，也有困惑、质疑甚至批判的一面。他的立场在很多时候是含混的，思想中具有两重性，他的小说具有开放性和不定性（Mcintosh, 2007，p.23）。这些特点说明梅尔维尔的小说拒绝绝对性的、单一的阐释，和巴赫金（Bakhtin）（1998a，p.13）所推崇的狂欢诗学的多义性、含混性、未完成性等精神内质不谋而合。本文以《白鲸》为例，结合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揭示其作品具有提倡多元文化和相对主义、拒绝单一文化和绝对主义的内涵。

一、人物的加冕和脱冕

狂欢文化的精神实质是自由平等（巴赫金，1998a，p.128），嘲弄和否定一切官方的、权威的、传统的、等级的单一文化。所以，一切高高在上的人物和事物在狂欢文化中都成为降格、颠覆的对象。民间狂欢节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加冕和脱冕仪式，扮演狂欢国王的小丑在狂欢节尾声时被打倒了。加冕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后来的脱冕，两者合二为一，象征一种生死更换、新旧交替的循环式变化，是对固定边界和等级制度的消解，“说明任何权势和地位都具有令人发笑的相对性”（巴赫金，1998b，p.163）。

《白鲸》的故事是捕鲸船“披谷德号”的船长埃哈伯（Ahab）被白鲸莫比·迪克咬断一条腿，他带领船员疯狂地追杀它，最后整艘船反被它撞破沉入大海，只有以实玛利（Ishmael）一人得以幸

存。小说中“披谷德号”是一个等级分明的微型社会（周玉军，2012，p.202），而等级观念和世俗传统正是这部作品所要颠覆的对象（Porter，2007，p.76）。作为主角，捕鲸船的最高领导埃哈伯船长当然是加冕和脱冕的主要对象。小说中他还是美国白人文化的代表，是个人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扩张主义等美国民族精神的象征。作者以多维度的视角来塑造人物形象，通过对埃哈伯的加冕展现了美国白人视野中唯我独尊的自我形象，而对其脱冕则体现作者对白人文化的质疑和批判。

小说从一开始关于埃哈伯的那些神秘的传闻传递了一个非凡的、具有王者气概的人物形象，也让新水手以实玛利对他形成一种敬畏的心理，这是作者对他的加冕。例如捕鲸船的经纪人法勒说他不是平常人，像上帝一般，他的长矛百发百中，在食人生番中呆过，经常接触“比海浪更深奥的稀罕事”，“古时的埃哈伯，你知道，那是戴上王冠的国王啊”（梅尔维尔，2001，p.117）¹。在船开航的一段时间里，埃哈伯隐居在船长室里，只通过三个副手发号施令，这让他更增添一份神秘的、孤家寡人的气质。作者把船上的副手和镖枪手称为骑士和随从，而他们的“最高主子和独裁者”埃哈伯就是这艘船的帝王了（p.163）。他头脑中的某种君王思想化作“一种难以抗拒的独裁行径”（p.192）。他成功地煽动船员帮他向令人闻风丧胆的白鲸复仇，体现了他对整条船的绝对控制和无上权威。他是“船上的可汗，海上的国王以及那些大海怪的伟大主宰”（p.171）。他首次露面时，作者别出心裁的外貌描写展现了一个有着非凡经历的人：

“他活像一个从火刑柱上放下来的人，火焰虽说烧伤了所有他的四肢，却没有毁了它们……他的整个高大魁伟的形象像是用实实在在的青铜在一个无可更改的模子里铸成，犹如切利尼雕刻的《帕尔修斯》像”（p.164）。

作者对古希腊神话英雄帕尔修斯的联想突出了埃哈伯非凡的气概。他直立着，眼睛笔直朝前望去，透露出一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刚毅果敢，一种矢志不移、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尽管他受尽被鲸鱼咬断腿的苦痛，但“依然保有王者的不可名状的傲视一切的尊严”（p.165-166）。他在第36和119章发表了两场要挑战白鲸和上帝的演讲，体现了他坚强不屈、独立自主的个性。

小说指出埃哈伯的伟大是病态的（p.110），这说明他具有多重、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在他身上，美丽与丑陋，善良与罪恶，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卑微并存”（央泉，2014，p.116）。作者对他的脱冕几乎和加冕同步进行，以此突出他复杂多重的性格。他的名字本身就兼有加冕和脱冕的内涵，它实际源自《圣经》。《圣经》的埃哈伯原型是古以色列的国王，也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的人物，他颇有才略，曾给国家带来繁荣稳定，然而因亵渎上帝、残暴不仁被杀了。小说中埃哈伯的内心独白还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通过影射《圣经》和莎剧，他被塑造为一个“专为崇高的悲剧而设置”的人物（p.110），所以他的英雄落幕迟早会来。小说出现了一些先知式的人物，如以利亚（Elijah）、迦百列（Gabriel）和费达拉（Fedallah），他们都预言了埃哈伯的死亡。其他船员对他的评价也揭示了他复杂矛盾的性格，起到脱冕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他不乏有邪恶的一面，是一个

¹本文中《白鲸》的引文均来自成时的译本，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暴君和疯子。例如斯塔勃克（Starbuck）认为他反对被人支配，“要当一个民主派，”自己却专横跋扈、唯我独尊，对别人“作威作福”（p.219）。皮普（Pip）认为他是条可怕的大蟒蛇。法勒（Peleg）说：

“要说有什么病吧，看脸色又不像。说实在的，他没病；不，不对，他也并不健康。……他是了个了不起的，不信上帝又像上帝似的人物。……有一阵子他精神不大正常……他变得喜怒无常”（p.117）。

以实玛利认为他的报仇之心是一种神经错乱，“一种丧失理性的病态心理”（p.239）。“恩德比号”的船长听说他要追杀白鲸，也在质疑他“是不是疯了？”（p.541）

内心独白在巴赫金（1998b, p.99）看来是一种“微型对话”，也具有脱冕的作用。埃哈伯的内心独白凸显了他的双重性格，证明了他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尽管他在船上不可一世，但对自己的命运总有一种不祥之兆。例如他走下房舱时自言自语，“像我这样的老船长，走下这窄窄的小舱口……就好比往下走进自己的墓穴”（p.168）。他像一位迟暮之年的老国王，感到自己终将被淘汰。对他的落落寡欢、孤家寡人的境遇，作者讽刺地说，在“潦倒的暮年，他把自己的灵魂关在他的躯干的空洞中，气忿忿地吮着那惨淡光景的脚掌过日子”（p.199）。作者刻画了他不可一世的王者威风，也说他是个“可怜的捕鲸老头”（p.192）。第30章作者将他比为丹麦国王、海上国王，然后笔锋一转，又以他的独白来展现他的内心烦恼，“这抽烟居然排解不了苦恼。我的烟斗啊！要是连你也没有了法力，那我的日子就难过喽……[我]活像那快死的鲸鱼”（p.171），然后他干脆将烟斗扔到海里。这一动作象征一种脱冕的仪式，他扔掉能给人提供放松快乐的烟斗，意味着他向痛苦和死亡的靠拢。他认为自己遭到天谴，丧失了以往的享受能力，对一切可爱的事物都感到痛苦。他自诩为头戴“伦巴第铁制皇冠”的人（p.217），然而这带给他的不是荣耀，而是让他感到不祥，感到脑筋发疼。他承认复仇之心使他“成了恶魔，我是疯上加疯”（p.218）。正如巴赫金（1998b, p.153）对狂欢文化中精神心理题材的分析所示，埃哈伯的精神错乱、近乎发狂的复仇欲念展现了他个性分裂中的另外一个自我。狂欢文化中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核心是新老交替的精神。埃哈伯的固执代表一种僵死、老化的观念，一个“即将逝去的、垂死的旧世界”（巴赫金，1998a, p.235），而小说另一个人物以实玛利（如下文分析所示）代表一种流动、新生的观念和生命，故事结尾前者的死去，后者的得救正是旧事物结束、新事物开始的表征。

二、白人文化中心地位的瓦解

多元化是巴赫金思想的基本特点，他提倡差异性和多样性。若干多元异质的文化构成了一个文化整体，每种不同的文化都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所以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就是各种不同话语和声音共存的世界。一切所谓的“权威声音”“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因为各种文化的交流对话而瓦解，“一言堂”的大一统文化格局也被打破。在美国，白人文化占主流地位，同时也存在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和其他移民所带来的文化，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然而，基于强化民族认同的需要，美国

白人在对待自己和外部社会时有一种自以为是的“使命感”，对其它文明进行排斥和压迫，试图说服、诱导或强迫它们遵从盎格鲁一新教文化的基本要求（袁先来，2016，p.11）。狂欢文化取消了绝对的理念，代之以快乐的相对性精神（夏忠宪，1994，p.81）。在梅尔维尔笔下，白人文化唯我独尊的绝对性地位受到了质疑。他的作品充满对非白人文化的描写，他不单单看到了异族文化，还在文化碰撞中摆脱原有的批评话语体系，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西方文明（李安斌、卢俊霖，2017，p.105）。

《白鲸》的以实玛利在客店遇到了来自南太平洋海岛的土著人季奎格（Queequeg）。在西方白人文化视野中，非白色人种具有野蛮、邪恶的形象。由于对季奎格的成见和无知，以实玛利一开始很害怕他。然而，后来他们成了知心朋友。他成为以实玛利反思文明与野蛮的参照。因为季奎格，以实玛利跨越、模糊了文明与野蛮、基督教与异教的界限，以超然的姿态去重新审视西方文明，从而对白人视野中“固有的文化认知模式和根深蒂固的成见”进行质疑，甚至颠覆（Porter，2007，p.94）。在客栈中，以实玛利说：

“外面的风暴一阵紧似一阵地咆哮。我开始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感觉身内有什么在溶化。……我破碎的心和疯狂的手不再去反对那个虎狼世界。这个使人安心的蛮子已经改变了它。他坐在那儿，他的漠然无动于衷本身象征着一个其中并无暗藏着的表面文明的伪善和貌似和善的欺诈的天地”（p.84）。

也就是说，短短时间的相处让以实玛利之前对季奎格的恐惧、偏见和所接受的基督教文化教育完全瓦解了。在西方基督文化视野中，土著人是还没受上帝感化的野蛮人，他们必须经过教化才能为西方白人社会所接纳。然而，在这里文明与野蛮、基督与异教的地位发生了倒置，对照着季奎格这样朴实正直的土著人，西方文明社会在以实玛利眼里反而是个伪善野蛮的世界。之后，他们俩一起对季奎格随身所带的木偶神像进行礼拜。这是与基督教义背道而驰的，因为基督教义禁止偶像崇拜，禁止多神主义。然而以实玛利认为“你希望别人如何待你，你便如何待人——这便是上帝的旨意”（p.85）。在此，异族文化让他学会换位思考，从对方的立场来反思自身文化的问题，进行平等对话。

以实玛利还说季奎格是“食人生番中长成的乔治·华盛顿”，因为他的额头突出而宽广，让人想起“常见的华盛顿将军的半身塑像上的头颅”（p.83）。华盛顿是美国的缔造者，季奎格是满身纹身、行为古怪的蛮子，这两人被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耐人寻味。据研究，在梅尔维尔的时代，华盛顿的塑像遍布全国，他的纪念碑也随处可见（Maloney，2006，p.105）。对美国人来说，他是国父，是真理、正义和权威的缔造者。因此，将季奎格这个文化“他者”和一个民族英雄等同视之，作者打破了偶像崇拜，颠覆了白人至上主义。他的立场非常明确，美国不是由某个像华盛顿这样的白人英雄建立的，而是由众多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的普通人建立的，正如埃哈伯的捕鲸队是由来自不同国家和种族的水手组成的一样。对这些异族水手，作者在书中不吝赞美之词。例如第二十七章对季奎格、塔希特戈（Tashtego）和达果（Daggoo）这三个异教徒镖枪手的伟岸体格的描写透射出

他们朴实高贵的灵魂，让白人在其面前也有自愧不如的感觉。

作者民主平等的思想在小说的开头就已流露出来，以实玛利对自己出海当个任人使唤的普通水手这么解释：

我每次出海都是当水手，为的是那船头楼甲板上的有益健康的运动和洁净的空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顶风的时候远比风从船艄吹来的时候多。……所以司令官呆在后甲板上，他呼吸的气息多半就是在船头楼里水手们排泄出来的。司令以为空气首先到达他那里，其实不然。在别的许多事情上，平民百姓也大抵领先于他们的领袖（p.32）。

这里对船长和普通水手所呼吸的空气进行戏谑的对比，使两者的地位产生了反转倒置（Cowan, 1984, p.74）。作者将其推而广之，使它变成一个能颠覆传统和等级观念的普遍原则，认为在很多事情上百姓领先于领袖。美国作家有以船比喻国家的传统，《白鲸》的“披谷德号”是美国国家的象征，而船长埃哈伯和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O Captain! My Captain!*）中的船长一样，是象征国家领导人的修辞。作者对船长的权威和地位的颠覆体现了民主平等的思想，对他来说，一艘船更多是靠水手的劳动，而不是船长。由此类推，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荣更多是靠普通百姓的奋斗，而不是某个白人英雄的领导。在他眼里，美国民主社会不同于欧洲等级社会，普通百姓应该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他在书中指出平民身上令人肃然起敬的尊严与“帝王将相”、“庙堂的官爵”无关，而是见之于“挥镐打桩的人”，甚至“最卑贱的海员、叛教者和为人所不齿的人”也有高贵的品质（p.156）。像古代诗人向文艺女神缪斯祈求灵感一样，作者祈求“伟大的民主之神”证明他以凡夫俗子作为创作的主角是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他这部美国民族史诗要讴歌的是平民百姓。

梅尔维尔对普通民众、多元文化等的关注也是为了服务民族文化独创的目的。因为十九世纪早期主导美国的白人文化其实也是欧陆传统的精英文化（张科，2020，p.88），所以，美国民族文化的独立，必须打破这些精英文化的统治，将目光转向大众文化、乃至移民文化和土著文化。

三、思想意识的对话

对话是巴赫金狂欢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指出“对话关系是一种普遍现象，浸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表现形式”（巴赫金，1998b，p.55）。它排除了统一的、绝对主义的独白形式，即排除了个人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彰显了个体的、民族的、社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谢明琪，2018，p.31）。对话可以在一个有冲突、矛盾意识的人内部进行自我对话，即“微型对话”，如上文对埃哈伯内心独白的分析所示，也可以发生在不同意识的人物之间产生思想的碰撞，即“大型对话”（巴赫金，1998b，p.96）。尽管埃哈伯以船长的身份和独裁的个性控制着整条船，但小说依然渗透着其他人物不同的声音和意识，具有多元化和多声部性质。如第九十九章众人都看着桅杆上的金币，“你看，我看，他看”（p.532），但每个人都对它的图案做出不同的阐释。从小说人物的角度来看，以实玛利是埃哈伯之外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这两人不同的世界观和人际观构成小说最明显的不同人物思想意识的交锋。

表面看，埃哈伯追杀白鲸是因为它咬断了他的一条腿，实际上是因为他将其视为一种象征压制着自己人格自由的异己力量，而不仅是一只凶猛的、没有灵性的动物而已。在他眼里，白鲸所象征的异己力量其实就是上帝，这个上帝高高在上，冷漠地俯视着众生在其所编织的命运之网中挣扎，无视他们的苦难和诉求（郝运慧、郭棲庆，2015，p.144）。埃哈伯痛恨上帝的这种无形控制，所以也痛恨象征上帝的白鲸。同十九世纪美国哲人爱默生一样，埃哈伯把自然界看作精神的象征，而不只是物质世界。然而，爱默生用理想和乐观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自然，把它视为美和善的化身。他强调精神（即超灵）是“宇宙间至为重要的存在因素”，超灵无所不在，存在于人和自然界内，是扬善抑恶的力量（常耀信，2006，p.165）。埃哈伯则用悲观消极的眼光看待自然，在它身上看到黑暗和邪恶。

以实玛利刚出场时和埃哈伯有些相似，他的情绪低落表明他也面临着人生的危机。他发现自己心情有如阴雨潮湿的冬天，会不由自主地在棺材铺门前逗留或跟在送葬队后面。他和埃哈伯也有很大的不同，后者认为物质世界后面隐藏着黑暗和邪恶，而困扰着以实玛利的不是他在物质之外看到什么“歹毒”的主宰，而是这个貌似充满意义的物质存在之外其实什么也没有（Bryant，1999，p.69），他陷在虚无主义之中。正如他在教堂中看到石碑时的感想所示，在那里他感到“一切信仰的销蚀”、“一片痛苦的虚无”（p.67）。

如果把爱默生和埃哈伯看作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两个极端代表的话，那么，以实玛利则是代表一种中庸。他对世界的理解不是非黑即白的，他的空白虚无也意味着多种阐释的可能，他认为世界是多元的，光明与黑暗同在，善良与邪恶并存。他“既不会对好人好事视而不见，对怪异可怖的人事也很快便能辩明”（p.33）。他从灿烂晴空中看到“蕴藏着致人死命的霹雳”（p.609），而当种种忧患痛苦向他袭来时，内心深处却“依然自我沐浴于永恒的欢乐的春风之中”（p.479）。在第35章他警告理想主义的哲学家天真地关注于一个简单化的世界观将会使人生陷入困境，正如水手在桅顶上冥想会导致走神掉入大海一样。以实玛利对事物的观察体现了一种多维视角：季奎格的斧头烟斗既可伤人，又可用来抽烟安抚灵魂；棺材也可以当作救生器；作为香料的龙涎香来自鲸鱼恶心的肠道；阿萨息提斯树林的鲸鱼骷髅上长满青翠的藤蔓，“生命拥抱着死亡，死亡支撑着生命”（p.551）；白色具有美丽、欢乐、纯洁、高贵的象征意义，又有死亡和恐怖的意蕴。以实玛利眼中这些现象具有狂欢世界的双重性，即“伪与真，恶与善，黑暗与光明，凶残与爱抚，死与生的经常混合”（巴赫金，1998a，p.503）。《白鲸》这部小说“阐述了宇宙万物具有双重意义的思想，而且明确指出了人们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吴富恒、王誉公，1999，p.179）。以实玛利对这些具有不定性和多义性的现象的思考，强调了一个多元复杂的世界，也体现意义的探索具有相对性和未完成性。他总能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去审视世界，而且认识到无论是哪种眼光，其中必定有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用任何单一的视角来探索终极意义的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的，所得的结论也是片面的。

面对生活中的危机和问题，埃哈伯和以实玛利的解决方式也很不一样。埃哈伯顽固不化、拒绝转变。他以暴制暴，对生活遭遇还以报复。而以实玛利则接受变化，“拥抱成长”（p.85），采取和解和友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尽管在小说开头他以一个悲观消极的形象出场，但他没有沉溺在悲观情绪中不能自拔，而是以出海看看外面世界的方式来避免自杀的悲剧。他也告诫人们要及时摆脱

消极情绪这种“半夜的幻觉，”这样才能避免“船毁人亡的惨剧”（p.519）。尽管蛮子季奎格曾经给他带来恐惧和威胁，他却主动与之接触，两人变成好朋友，而且后者的正直和忠实是促成他变化成长的重要因素，让他进行文化反思，审视白人文化的弊端和局限。从季奎格身上，他学到了友爱互助。季奎格两次分别舍身跳进海中和鲸油池去救人，展现了互爱互助的优秀品格，而身为捕鲸船二副的白人斯德布为了追捕鲸鱼，对不慎落水的皮普置之不理，致他被吓坏变成痴呆。这两者形成强烈对照，季奎格这面镜子照出了西方白人文明的虚伪和卑劣。

在人际关系上，埃哈伯自我孤立，独断独行，体现了爱默生的自助精神。爱默生在《论自助》（“Self-Reliance”）中强调了自助的人格意义，他相信个人的力量，而不是人群。在《美国哲人》（“The American Scholar”）中他还说，“世界是不足道的，人是一切，一切自然规律都在你心里。”他之所以相信个人的力量，是因为他认为“人是依上帝形象造出来的，只比上帝差一点”（常耀信，2006，pp.182-183），而埃哈伯走得更远，他不满足于“人比上帝差一点”的地位，他自己想成为上帝，而不是受人主宰。自助人格在埃哈伯那里得到过度放大，发展成为自私傲慢的极端个人主义。他一副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架子，他对自己也有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感到可耻，例如木匠给他做一条假腿，他却说“我在这儿，神气得好像一位希腊的天神，却在求一个蠢货给我一条腿，好让我站起来！……我真想像空气一样自由自在，可我欠下了整个世界的账”（p.575）。以实玛利则认为人人应该互助合作，同时他也甘愿屈身人下，做一个受人使唤的下手，因为他认为“谁又不是奴隶呢？”（p.31）季奎格的舍身救人使他认识到“这是个彼此依存、合股经营的世界”（p.96），并在捕鲸集体劳动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协同互助”理论。例如麻绳两端各拴住一位水手以便其中一位对死鲸鱼安全地进行割膘工作，这让以实玛利看到他们“成了一个两人的合股公司”，构成“生死与共的情谊”（p.400）。在猎捕鲸鱼时每人都有随时被曳鲸索拉出艇子丧命的危险，“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曳鲸索的包围中，人人都生来脖子里就有根绞索”（p.358）。这里他所指的不只是捕鲸行业，而且指涉任何社会生活，所有人无论是长官，还是普通水手，都是平等的，必须团结一起，构成命运共同体。水手们一起干揉捏鲸脂的活使他感到大家“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我们大家全都变成一个油乳交融的友善的共同体吧”。以实玛利的互助友爱原则与埃哈伯的孤立主义形成对照。同时，鲸脂的形状和气味还让以实玛利想到葡萄汁和紫罗兰的香味以及“在妻子，在心灵，在床上，桌上，马上，在炉火边，在乡间”的幸福，让他“感到种种敌对意气、暴躁情绪、邪恶念头顿时化为乌有，感到到达一种神圣的解脱境界”（p.511）。这表明他愿意去拥抱日常生活的乐趣和爱，抛弃那些愤世嫉俗的消极意念。与此相反，埃哈伯一气之下扔掉烟斗，断绝对家中妻儿的思念，义无反顾地追杀白鲸，这象征他对正常生活情趣、乃至人性的抛弃。

四、结语

作为一个新兴的多种族、多民族的移民国家，19 世纪的美国在文化上已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多元性。另外，此时美国正处在文化转型时期，谋求文化独立创新的使命促使美国人在对欧洲文化传统的扬弃中更积极主动地利用本土文化资源进行创作。所以，新旧思想价值观念的交替以及不同文化的融汇和碰撞使美国的社会文化更加呈现多元对话、众声喧哗的特点。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

梅尔维尔在水手生涯中接触过各式人物和文化的人生经历，无疑为他的创作创新奠定了基础。他具有狂欢特点的写作正是社会文化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反映。《白鲸》的埃哈伯船长在小说的“微型社会”中是权威和统治的代表，也是美国白人文化的象征，小说在对其加冕和脱冕中展现了多重、复杂的人物性格，也说明社会权势和地位具有相对性，体现了狂欢文化中自由平等的精神。作者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质疑和批判不只体现在具体象征人物的塑造上，还利用边缘化的事物对其进行嘲弄和颠覆。他在有色人种文化中观照白人文化，从而瓦解后者唯我独尊的中心地位，呈现多元异质文化平等共存的格局。小说不同人物思想意识的交锋形成了对话关系，彰显了个体意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Huang Yonglia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9991-348X>

References

- 米哈伊尔·巴赫金（1998a）：《拉伯雷研究》，李兆林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 [Bakhtin, Mikhail (1998a).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lated by Li Zhaolin et al. Hebei Education Press.]
- 米哈伊尔·巴赫金（1998b）：《诗学与访谈》，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 [Bakhtin, Mikhail (1998b). *Poetics and Interviews*, translated by Bai Chunren et al. Hebei Education Press.]
- Bryant, John (1999). “Moby-Dick as Revolu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rman Melville*, edited by R. S. Levin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65-90.
- 常耀信（2006）：《美国文学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
- [Chang Yaixin (2006).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1). Nankai UP.]
- Cowan, Bainard (1982). *Exiled Waters: Moby-Dick and the Crisis of Allegory*. Louisiana State UP, 1982.
- 郝运慧、郭棲庆（2015）：“麦尔维尔的宗教求索之路：兼论麦尔维尔与尼采的宗教亲缘性”，《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05）：143-150。
- [Hao Yunhui, Guo Qiqing (2015). “A Study of Herman Melville’s Religious Quest: With Comments on Nietzschean and Religious Affinity.”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05): 143-150.]
- 李安斌、卢俊霖（2017）：“麦尔维尔的视界与 19 世纪美国文学中人神关系的转型”，《当代文坛》（04）：105-108。
- [Li Anbin, Lu Junlin (2017). “Melville’s Vis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in 19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04): 105-108.]
- 刘意青（2020）：“如何看待人生的善与恶——对梅尔维尔和霍桑的比较探讨”，《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03）：1-8。

- [Liu Yiqing (2020). "How to View Good and Evil of Lif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lville and Hawthorne." *Journal of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03): 1-8.]
- Maloney, Ian S (2006). *Melville's Monumental Imagination*. Routledge.
- Mcintosh, James (2007). "The Mariner's Multiple Quest." *New Essays on Moby-Dick*, edited by Richard H. Brodhead. Peking UP: 23-52.
- 赫尔曼·梅尔维尔 (2001): 《白鲸》, 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 [Melville, Herman (2001). *Moby-Dick*, translated by Cheng Shi.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Porter, Carolyn (2007). "Call Me Ishmael, or How to Make Double-talk Speak." *New Essays on Moby-Dick*, edited by Richard H. Brodhead. Peking UP: 73-108.
- 吴富恒、王誉公 (1999): 《美国作家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 [Wu Fuheng, Wang Yugong (1999). *On American Writers*.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 夏忠宪 (1994):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05): 74-83。
- [Xia Zhongxian (1994). "Bakhtin's Theory of Carnavalesque Poetics."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05): 74-83.]
- 央泉 (2014): "英雄还是恶魔: 《白鲸》主人公亚哈形象新解", 《外国文学研究》(03): 110-118。
- [Yang Quan (2014). "Savior or Demon: A New Perspective on Captain Ahab in *Moby-Dick*."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3): 110-118.]
- 杨金才 (2017):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南京大学出版社。
- [Yang Jincai (2017).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Herman Melville*. Nanjing UP.]
- 袁先来 (2016): 《盎格鲁—新教源流与早期美国文学的文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 [Yuan Xianlai (2016). *The Origin of the Anglo-Protestantism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Peking UP.]
- 张科 (2020): "经典的沉浮——麦尔维尔在英美", 《外国文学》(03): 83-93。
- [Zhang Ke (2020). "Ups and Downs in Literary Canon: Herman Melville in Britain and America." *Foreign Literature* (03): 83-93.]
- 周玉军 (2012): "服从或反抗: 《白鲸》中的社会关系初探", 《外国文学评论》(01): 201-215。
- [Zhou Yujun (2012). "Obedience or Resistance: A Study of Social Relations in *Moby-Dick*."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01): 201-215.]